

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中美贸易摩擦透视

张明志, 岳 帅

【摘 要】与以往贸易摩擦不同,此轮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关税更多集中于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这表明此轮中美贸易摩擦从本质上讲是美国对中国进行的战略遏制。中美贸易摩擦将通过多边、区域和双边贸易体系、生产者行为、消费市场等因素的影响,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与贸易体系造成破坏并重构,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可以借此实现“制造业回流”。在中国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逐渐丧失的背景下,美国采用技术阻断的方式挑起贸易摩擦,将进一步抑制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和位置攀升,影响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获益水平。中国可以从兼顾 GVC(国内价值链)与 NVC(国际价值链),加强核心技术研发,推动多边、区域及双边贸易体系发展,实现出口市场和原材料、关键零部件进口市场多元化等方面入手,最大程度地降低中美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着力突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稳步攀升。

【关键词】中美贸易摩擦 全球价值链 效应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人口结构变动与中国出口转型升级研究”(17BJY146);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国际贸易与产业发展”(20720171001)

【收稿日期】2019-02-18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19)02-0087-06

一、引言

特朗普执政后,美国政府推行“制造业回流”“逆全球化”的贸易保护战略,并以美国对中国贸易存在巨额逆差为由,挑起中美贸易摩擦。2018年3月初美国宣布就进口的铝和钢铁制品分别征收10%和25%的进口关税,之后又宣布针对中国知识产权侵权对500亿美元中国出口商品加征关税,并对中国的投资采取限制措施。作为反击,中国采取类似反制措施。此轮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最终演化为中美贸易战。与以往贸易摩擦相类似,美国仍然打着对中国贸易存在巨额逆差的旗号,但不同的是,美国政府加征关税的范围更多地包含医疗器械、高铁设备、生物医药、新材料、信息技术和航空设备等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产品,矛头直指“中国制造2025”,同时指责中国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强制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等行为。这表明,此次中美贸易摩擦虽然直接起因于严重的贸易失衡,但更多的是缘于中美经贸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与贸易体系中地位的不断攀升使得中美双方贸易中竞争性的成分增加,互补性的成分减少,美国为维护自己在

国际分工中的霸权地位,再次举起贸易保护主义大旗,对中国技术进步和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进行战略遏制。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国家间贸易往来由原先简单的最终产品贸易转变为中间品贸易和价值链生产环节的分工与协作,某一生产环节在遭受到严重的外部冲击之后将迅速传递到其他生产环节,引发连锁效应,从而波及整个全球价值链。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高筑贸易壁垒,挑起中美贸易争端,在抑制两国贸易发展的同时,也将促进生产环节转移、打破现有全球价值链分工与贸易体系,迫使全球价值链重构。不仅如此,此次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加大了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限制,这是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攀升最直接的遏制。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依靠劳动力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且目前仍处于低端位置,产品生产附加值和获利较低,这使中国面临着陷入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风险。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使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的攀升更显困难。因此,分析中美贸易摩擦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破坏、重构作用,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地位的影响,可以更

好地回答如何在外部环境恶化的背景下打破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低端锁定这一问题,其研究意义重大。

二、中美贸易摩擦对全球价值链的破坏与重构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与贸易体系下,受市场经济规律和经济利益驱动,跨国公司将根据多边、区域及双边贸易关系安排、生产成本及消费市场等多重因素,在全球范围内布局生产环节及设计、研发、销售、包装等附加业务。美国挑起贸易摩擦,对中国相关产品出口征收惩罚性关税,并对中国投资实行限制,不仅是对以 WTO 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系的公然挑衅,而且直接改变了影响跨国公司布局生产环节的相关因素,必将促使相关跨国公司再次审视产业布局和发展战略,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选择生产工序的最优生产地,迫使现有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断裂并重构。

(一)中美贸易摩擦通过挑战多边、区域和双边贸易体系迫使全球价值链重构

二战后,从 GATT 到 WTO 的全球多边贸易体系一直以来都在倡导着低关税、低贸易壁垒的贸易政策,有效促进了贸易自由化的顺利推进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但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逐步建立,对全球多边贸易体系提出了诸如全面削减中间品贸易壁垒、服务贸易更加自由化等新要求,而自“多哈”谈判以来,多边贸易体系却一直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陷入停滞不前的境地。在此背景下,区域和双边贸易协定蓬勃发展,区域经济合作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已经陷入停滞的多边贸易体系的不足。然而,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尤其是特朗普执政之后,美国政府将国内失业和财政赤字问题归咎为贸易自由化引起的贸易逆差特别是来自中国的贸易逆差,于是奉行“美国优先”政策,不惜以各种借口挑起贸易争端。

2017 年中国占据美国贸易逆差的 47.2%。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中美贸易摩擦是美国实施“制造业回流”“逆经济全球化”等战略的具体体现,其实质就是贸易保护主义在美国的重新抬头。而贸易保护主义是对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和当前正迅速发展的区域及双边贸易体系的最大威胁和挑战。单就“制造业回流”战略而言,美国逼迫相关跨国公司将部分生产环节转移至美国国内,显然是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严重破坏。以 WTO 为

代表的多边贸易体系原本就不能很好地满足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发展要求,中美贸易摩擦通过破坏多边、区域及双边贸易体系的发展,进一步加大了对当前 WTO 改革和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冲击和干扰。

在现代经济尤其是全球价值链分工与贸易体系中,契约精神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此轮中美贸易摩擦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跨国公司对国家间多边、区域及双边贸易关系的信任度。正如诸多文献所指出的,良好的制度环境对于贸易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如 Koukhartchouk 和 Maurel (2003)^①、De Groot (2004)^②、Den Butter 和 Mosch (2003)^③等。虽然上述研究仅仅将制度定义为国内制度,但违背或践踏多边、区域及双边贸易体系之契约精神与违背国内制度并无本质差异,二者终将为生产经营或贸易活动带来较强的不确定性,从而阻碍贸易的发展。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一国无论是最终产品还是中间产品的生产都更多地依赖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中间品投入,因此与传统贸易相比,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对契约精神的依赖度会更高一些。贸易协定的调整 and 变化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与贸易体系的影响也更加深刻。除此之外,与一般商品相比,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在生产中会涉及更多的中间投入品或专有投资。因此,多边、区域及双边贸易体系的变动对高技术产品在全球范围内布局生产环节的影响会更加直接,也更为强烈。可见,中美贸易摩擦对多边、区域及双边贸易体系所带来的冲击,不仅对各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广度和深度产生重要影响,而且直接关系到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各国是否愿意将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产品或生产环节配置到或外包给其他国家或地区。

(二)中美贸易摩擦通过影响生产者行为迫使全球价值链重构

跨国公司是全球价值链的直接构建者和参与

① O. Koukhartchouk, M. Maurel. *Accession to the WTO and EU Enlargement: What Potential for Trade Increase?.*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2003: 1—30.

② Henri L. F. De Groot, Gert-Jan Linders, P. Rietveld, et al. *The Institutional Determinants of Bilateral Trade Patterns.* Kyklos, 2004(57): 103—123.

③ F. A. G. D. Butter, R. H. J. Mosch. *Trade, Trust and Transaction Cost.*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03, 03—082/3.

者,其行为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与贸易体系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作用。中美贸易摩擦通过作用于贸易成本和投资的不确定性影响跨国公司的行为,进而导致对全球价值链的破坏和重构。

1. 中美贸易摩擦增加生产者贸易成本,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

关税是贸易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税上涨将直接增加企业的贸易成本。樊海潮、张丽娜(2018)^①在 Melitz 和 Ottaviano(2008)^②模型的基础上通过构建理论框架并进行参数量化估计后发现,贸易成本对企业利润具有反向影响,即关税壁垒引发的贸易成本上涨将削减企业利润。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与贸易体系下,中美贸易摩擦对其他相关国家的贸易成本和进出口贸易均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根据韩国产业研究院的分析,若中美贸易摩擦迫使中国对美国出口缩水 10%,中国对韩国进口额将减少约 282.6 亿美元,占中国从韩国进口总额的 20%,其中,中间品环节较多的电器装备行业所受冲击最大,进口将减少 109.2 亿美元^③。因此,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生产成本增加、利润缩水、相关产业链和生产工序竞争力减弱将是大概率事件。面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的竞争力受损,部分跨国公司可能会加速将产业链中中国参与的部分生产环节转移至东南亚等生产成本更低的国家或地区,全球价值链被迫重构。

2. 中美贸易摩擦增加生产者收益的不确定性,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

首先,在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企业利润的不确定性将显著增加。利润的不确定降低了投资者从事生产经营的信心,增加了投资者生产经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种对未来收益预期的不确定性可能直接影响到生产经营决策,或通过资本市场传递到投资行为进而对跨国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影响。事实上,此次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资本市场尤其是 A 股市场的影响非常迅速且强烈,其间几轮中美经贸谈判甚至特朗普的推特都牵动了中国资本市场敏感的神经。

其次,中美贸易摩擦将使中国出口规模缩减,而出口顺差是中国国际收支顺差的主要构成部分;出口规模缩减将恶化经常项目,威胁到人民币币值的相对稳定。自 2005 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基本上维持了上升态势,2014 年之后人民币贬值趋势明显,2016 年以来人民币汇率

变动愈加频繁,呈现出升值与贬值的双向波动。实际上,此次中美贸易摩擦也直接影响到外汇市场,特别是,心理冲击远甚于实质冲击,人民币汇率的双向波动明显加剧。2018 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先是逐渐走强高达 6.259,4 月中旬后贬值低至 6.973。

因此,中美贸易摩擦会通过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增加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收益的不确定性,很可能迫使跨国公司将生产环节转移至生产成本较低且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更加稳定的国家或地区,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

(三) 中美贸易摩擦通过影响消费市场迫使全球价值链重构

价格是影响需求最重要的因素,商品价格的变动必将对消费市场产生重要影响。伴随着交通信息技术的发展,虽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消费市场对跨国公司生产布局的影响逐渐降低,但消费需求变动仍将通过影响生产者收益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生产环节的布局产生一定的引导作用。

美国主要采用提高关税税率、构建关税壁垒的手段对中国挑起贸易摩擦,中国采取相应反制措施。关税壁垒在一定幅度上将提高进口商品价格。美国提高关税税率将抬高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的价格,减少美国消费者对从中国进口商品的需求,其后果是:一方面,缩减跨国公司在中国布局生产环节的收益,引导跨国公司将生产环节及其附加部分布局在加拿大、墨西哥、欧洲等与美国双边或诸边贸易关系较为牢固的国家或地区,促进全球价值链重构;另一方面,中国被迫进一步开拓西亚、欧洲等地市场,从而对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也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特别是,中国采取反制措施对从美国进口商品加收关税,且主要集中于大豆、玉米等农产品领域。由于中国是人口大国,对农产品需求量大、依赖较强,且农产品大多缺乏需求价格弹性,农产品及其制品价格的上升迫使中国拓宽农产品进口渠道或将相关食品加工业转移至农产品成本较低的国家或地区,也将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

可见,中美贸易摩擦通过挑战多边、区域及双

① 樊海潮、张丽娜:《中间品贸易与中美贸易摩擦的福利效应:基于理论与量化分析的研究》,载《中国工业经济》2018 年第 9 期。

② M. J. Melitz, G. Ottaviano. *Market Size, Trade and Productivity*.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8(75):295—316.

③ 相关信息来自韩国《朝鲜日报》,2018-06-18。

边贸易体系、影响生产者和消费者行为等路径带来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破坏与重构。具体来说,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将主要加速向南亚、东南亚等地区转移,资本和技术含量较高的生产环节可能转移至日韩、欧洲等国家或地区。那么,试图通过加征关税来促进美国“制造业回流”的战略真的可以使美国复兴制造业、增加就业,并促进全球价值链中生产制造等环节回流吗?显然未必。中美贸易摩擦虽然可能致使美国进口中国产品成本上升、价格上涨,削弱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但美国国内劳动力成本过高,在劳动密集产品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制造环节上已不具备任何比较优势,中美贸易摩擦只会进一步加快中国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以及东南亚等劳动力比较优势相对明显的国家或地区转移。其实,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为摆脱单纯依靠虚拟经济发展存在的脆弱性,美国就一直在推行“制造业回流”的政策,但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一直在11.5%—12.5%波动,低于金融危机前12.8%的水平,甚至2016—2017年出现连续下降。并且,即使将来美国依靠大机器生产、效率提升促进制造业回流,但对于美国就业的增加也将无济于事。

三、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

加入WTO以来,中国逐渐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主要参与者,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与贸易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对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此次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参与度、地位和贸易获利将会产生重要影响。

(一)中美贸易摩擦减缓或降低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自身拥有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优势和良好的投资环境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在取得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同时,伴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资源储量的不断减少和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等问题的凸显,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传统要素优势逐渐削弱甚至不复存在,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参与度已经面临着诸多挑战。

中美贸易摩擦爆发后,美国对中国征收惩罚性

关税并限制对中国的投资,跨国公司受市场经济规律和利润最大化目标的驱使,不仅可能缩减或改变在中国布局新的生产环节的计划,而且可能会加速将原在中国布局的产业或生产环节转移至贸易成本更加低廉、生产与消费预期环境更加稳定的国家或地区。在中美贸易中,中国从美国进口的产品中约70%为中间投入品,而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中这一比例约为30%,观察此次中美贸易摩擦加征关税清单发现,此次加征关税的产品大多涉及中间投入品。刘斌等(2015)发现针对中间投入品征收关税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参与度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①因此,在中国传统要素优势逐渐丧失的背景下,此次对中间投入品关注较多的贸易摩擦将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参与度产生更加强烈的影响。从现实情况看,部分行业已开始采取措施实施产业转移。例如,2018年4月,针对美国新关税政策,鞋类品牌Puma制定应急计划,将部分生产线从中国转至亚洲其他国家或地区。^②2018年9月,日本铃木将生产基地转移至印尼和泰国。^③

(二)中美贸易摩擦遏制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提升

在传统要素优势不断丧失的背景下,中国亟需寻找新的推动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动力,而推动技术进步不仅可以促进中国更加深入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而且对于摆脱中国可能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困境,促进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的提升等均具有重要意义。实现技术创新主要存在自主创新和国外技术溢出两个途径,其中技术溢出建立在现有技术水平的基础上,成本低、见效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技术进步乃至经济发展从国外技术溢出中也获益良多。

此次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针对总值500亿美元含有重要工业技术价值的中国产品征收25%的关税,500亿美元商品清单的覆盖范围主要指向“中国制造2025”。由此可见,此次美国针对从中国进口商品建立贸易壁垒,在很大程度上以阻碍中国技

① 刘斌、王乃嘉、魏倩:《中间品关税减让与企业价值链参与》,载《中国软科学》2015年第8期。

② 相关信息来自凤凰新闻网, http://fashion.ifeng.com/a/20180822/40392615_0.shtml。

③ 相关信息来自财新网, <http://zgtrend.blog.caixin.com/archives/189861>。

术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为目的,将对中国的技术进步带来一定程度的阻断效应。杨飞等(2018)研究认为,中国对美国的技术赶超是美国此次挑起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动因。^①余振等(2018)更是发现,中国与贸易伙伴在某行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越接近,中国与该贸易伙伴发生贸易摩擦的频率越高,体现在相关行业的贸易摩擦数量越多。^②郭美新等(2018)采用CGE模型研究发现,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电脑行业的生产和出口抑制作用最强,分别为-14.669%和-25.628%,远高于受影响次之的纺织品行业的-6.515%和-21.305%。^③

简言之,美国发动此次贸易摩擦主要目的就是希望通过技术阻断遏制中国技术进步,进而阻碍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攀升,遏制中国的崛起,使中国陷入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下降和分工位置不高的双重困境。

(三)中美贸易摩擦减少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贸易获利

贸易利益是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出发点和归宿。从广义上讲,贸易利益不应仅仅包含贸易增加值,也应将技术进步、就业增加、居民福利水平提高等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溢出效应包含在内。只有这样,才能准确评估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贸易获益以及中美贸易摩擦对此造成的冲击。

1. 一国贸易增加值与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位置紧密联系,中美贸易摩擦所引致的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地位攀升的困难将抑制中国贸易获益水平的提升。

2. 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作为国际技术溢出渠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获取先进技术的重要路径之一,中美贸易摩擦降低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对中国技术进步将产生负向作用。

3. 参与全球价值链引致的出口增加将通过规模效应、组合效应、联动效应等路径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史青、李平,2014)^④,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攀升则有助于增加高技术劳动力的就业比重,改善就业结构。由此不难看出,中美贸易摩擦降低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和位置将对中国就业增长和就业结构优化产生负面影响。

4. 就业增长缓慢将直接影响居民收入和幸福感,降低居民福利水平。当然,贸易摩擦若引起中国出口商品转内销与进口扩大,将有助于压低中国国内产品价格、增加实际工资,在一定程度上可能

会增加居民福利水平。但总体而言,中美贸易摩擦对贸易增加值、技术进步、就业及居民福利水平大都为负向影响,因此中美贸易摩擦将减少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贸易获益。

四、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若干思路

相较于传统贸易模式,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与贸易体系下,中美贸易摩擦将对中国经济社会产生更加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不断减缓、实现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非常迫切的背景下,保持对外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对于促进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和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而目前中国对外经济发展中劳动力等传统比较优势正在逐渐丧失,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的转换和升级正在形成。为此,中国必须积极应对,摆脱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和参与度降低的双重困境。

(一)积极推进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的梯度转移,促进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协同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位置有所攀升,但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的风险尚未有效解除。在中美贸易摩擦迫使全球价值链断裂并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的同时,美国在今后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很可能继续孤立中国,比如推广“毒丸条款”,因此中国对外经贸的发展特别是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攀升困难重重。与此同时,中国区域间在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上存在较大差距,东部地区正在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型升级,而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仍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推动产业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梯度转移具有较大空间。因此,应进一步在坚持对外开放的背景下,打破区域间经济割据的障碍,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形成互联互通的国内发展的良好格局;中西部地区应进一步做好基础设施建设以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并充分发挥中西部地区劳动资源丰富和东部地区技术、资本充足优势,建立

① 杨飞、孙文远、程瑶:《技术赶超是否引发中美贸易摩擦》,载《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10期。

② 余振、周冰惠、谢旭斌等:《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与中美贸易摩擦》,载《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7期。

③ 郭美新、陆琳、盛柳刚等:《反制中美贸易摩擦和扩大开放》,载《学术月刊》2018年第6期。

④ 史青、李平:《再议中国企业出口的就业效应》,载《财贸经济》2014年第10期。

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帮扶结对关系,用国内价值链(NVC)弥补全球价值链(GVC)的不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全球价值链的部分替代,从而促进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的协同发展。

(二)加强核心技术研发攻关,拓宽技术外溢渠道,提升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地位

此次美国发动贸易摩擦的一个鲜明特点或目的是隔断中国技术进步,阻碍中国高新技术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遏制中国出口产品增加值的提高和向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高端环节的攀升。而通过技术创新来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是打破中国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唯一路径。因此,要进一步加强科技研发活动的投入支持力度,积极开展联合攻关,提高对高技术人才的津贴,改善高技术人才待遇和研发环境,提高企业自主研发能力、推进核心技术研发,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推进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地位的攀升;拓展技术外溢渠道,寻找除美国外其他的替代技术源,预防和应对美国对中国的技术阻断和封锁。

(三)积极参与WTO改革,破解多边贸易体系困境,推动区域及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稳步发展,推进贸易合作共赢向纵深方向发展和演化

美国政府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给世界多边、区域和双边贸易体系带来严重冲击,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一直倡导并践行自由贸易原则并积极融入世界多边贸易体系,对多边贸易体系的建立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为更好地融入多边贸易体系,一方面,中国不仅要积极参与并推动WTO改革,促进多边贸易体系中相关制度的建设和完善,而且要扩大对外开放的力度,加快对内改革的步伐,特别是进一步建立健全国内贸易法律法规,修正与多边贸易规则相违背或矛盾的制度,以降低贸易摩擦带来的损害;另一方面,基于此次“中兴事件”,在加强企业合规教育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加强出口企业行为的自律、自查与自纠,并要求企业尽快建立合规监督管理体系,在制度上保障企业行为合规,增加出口企业防范类似中美贸易摩擦此类国际贸易变局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此外,在WTO“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停滞之后,区域及双边FTA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推进贸易自由化的现实选择和重要载体,中国应继续积极推动区域及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稳步发

展,从而不断实现贸易合作共赢向纵深方向的发展和演化。

(四)拓宽出口市场、原材料和关键零部件来源地,推进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同时,实现进口市场的多元化发展

出口市场、原材料和关键零部件来源是此次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和地位影响的重要中介。出口市场、原材料和关键零部件来源越集中于美国,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参与度和所处位置的影响就越大。因此,对于高度依赖美国出口市场、原材料和关键零部件的企业而言,应重新审视自身在出口市场、原材料和关键零部件获取等方面的定位。一方面,在出口市场方面,企业应进一步着力开拓欧盟、东南亚与“一带一路”沿线等国家地区消费需求,拓展出口市场空间,实现出口市场的进一步多元化。另一方面,应进一步拓宽原材料和关键零部件来源,保证原材料和关键零部件的稳定供应,努力实现进口市场的多元化发展,减少因可能的贸易摩擦增加而带来的利益损失,努力实现成本的最小化。

五、结 语

总体上看,此轮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地位攀升以及获益程度是个负向的冲击。当前,中美经贸问题高级别磋商正在进行之中,积极的信号也依稀可见,此轮中美贸易摩擦的演进与发展方向还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无论如何,对中美贸易摩擦可能产生的负向冲击及其传导机制作深入剖析,可以为将来更好地应对提供重要的前提和思路。同时,只有深入地分析此轮中美贸易争端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负面影响,才有可能形成一种倒逼机制,增强忧患意识,使中国社会各界特别是决策部门和企业未雨绸缪,并最终立于不败之地。总之,分析和探讨中美贸易摩擦对全球价值链的可能影响及其传导机制,保持警惕之心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当务之急。

(作者简介:张明志,福建仙游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岳帅,河南安阳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于尚艳;责任校对:于尚艳】